

# 试论认同多元化对中东局势发展的影响

叶 青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宗教和民族冲突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特别是宗教和文化因素在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上升,这给现实和理论研究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全球化和美国中东战略的刺激下,中东地区正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多重认同体系的特征,宗教认同对民族国家认同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它们之间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东内部矛盾的发展和局势走向。

**关键词** 认同;中东格局;多元文化

**作者简介** 叶青,硕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室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40)。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re appeared some new attributes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and ethnic conflicts. Particularly, religions and cultures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is region, which has presented a great challenge realist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Affected by globalization and US Middle East strategy, a conspicuous multi-identity system is looming in this area. Religious identity has posed an increasingly greater challenge to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ir interaction, to some extent, will affect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Identity; Middle East Pattern; Multi-Culture

宗教和民族冲突一直是导致中东地区热点不退,持续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冷战期间的美苏两极对峙的大格局下,宗教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现实的压制。当时,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建设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认同在与宗教文化认同的争夺中占据了一定的上风。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在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中东地区的宗教和民族冲突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特别是宗教和文化因素在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上升,这也顺应了当前国际政治现实和理论上两个方面的潮流。就现实世界而言,在全球化和后现代危机的冲击下,各种宗教似乎在世界上形成一次新的大范围崛起;从理论上来说,文化和宗教理论对传统现实主义范式提出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文化和认同理论正迎来新一轮的回归。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中东地区认同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宗教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理解当前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着特别的意义,当前中东格局的现实也为文化认同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个案,研究中东地区宗教和文化认同的变迁,对预测和评估中东地区未来格局的走向,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一、全球化的发展和美国中东战略的转变使中东的多重认同问题日益突出

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中东地区有着特殊而重要

的作用。中东地区向来是大国博弈的主要舞台,也汇集了各种全球性的问题和矛盾。因此,中东地区的格局发展往往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发展密切相关,中东的认同体系具有某种开放性,对外部世界的变化非常敏感,其演变的逻辑大多决定于外部因素对于本地区的输入强度。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主义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周期,民众越来越转向从伊斯兰文化中寻求认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美国中东战略的重大调整是影响中东地区认同结构向多元化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其一,在全球化潮流的迅猛冲击下,民族国家对辖下居民认同的垄断被打破,主权的统治地位越来越受到其他力量的侵蚀。当代的民族国家体系发端于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全球性的单一政治体系。全球范围的秩序不再只是产生地区秩序的各种政治体系的总和,也可称其为世界政治体系的产物。第一个全球性政治体系的表现形式是全球性国家体系,欧洲国家体系扩展到全世界并且演变为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体系。”<sup>①</sup>中东地区也不例外。二战后以及随之而来的非殖民化浪潮帮助确定了民族主义在大多数中东国家的统治地位,

①【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虽然民族国家的建设在中东地区带有许多先在的特点与不足,但在冷战期间,民族国家体系还是比较稳固地在中东地区确立下来,并成为研究中东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sup>①</sup>

冷战后,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学者们日益关注国际社会的两元特征:统一和分化并存发展的趋势。民族国家排他的、独享领土内人民认同的超然地位已经不复存在,民族国家在超国家和次国家两个层面都受到挑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出现权威和认同的重叠。德国学者耶尔格·弗里德里希发展了阿诺尔德·沃尔弗和赫德利·布尔的将中世纪主义体系界定为权威重叠和效忠多重体系的观点,拓展了新中世纪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在三个因素影响下所面临的困境:一是统治国际关系理论 50 余年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受到挑战;二是根据全球化理论,民族国家正在受到经济、技术和社会变革等因素的侵蚀;三是根据分化理论,民族国家受到沿着种族、文化和宗教的界限出现和再现的分化的侵蚀。<sup>②</sup>如果说在 70 年代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的话,那么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则促使人们更多从宗教和文化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些文化和认同理论家对权威重叠和认同竞争体系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被削弱的民族国家和日益活跃的市民社会的关系上。正如费格森和马斯巴赫所指出的,“我们应该将全球政治看作是正在演化中的各种‘实体’的世界,而不是国家的世界,应该聚焦在权威、认同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上”<sup>③</sup>。一方面,民族国家遭到削弱,另一方面以宗教和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其他认同群体不断崛起,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力量平衡开始慢慢发生转变,其结果是,“某些实体‘安居’或嵌入在其他实体中,就好像一种形式的实体被叠加在另一个之上。一种形式可能会丧失其部分的独立身份和自治,但在这种过程中,主导的实体

可能会获取它所结合的某个(些)实体的一些特征。”<sup>④</sup>这在中东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伊斯兰认同不仅成为新的认同的来源,也成为旧的认同重新确立自己的媒介,中东伊斯兰地区表现出强烈的多重认同体系的特征。

其二,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厉行反恐战略,进一步打破了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之间的力量平衡,使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自布什总统当政以来,美国的中东战略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9·11”事件是关键的转折点。

首先,与克林顿政府时期相比,布什上台后,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获得极大的提升。从领导层方面而言,随着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决策层影响力的不断上升,美国的中东政策也日趋强硬和激进,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考虑到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得势和布什总统本人的宗教信仰背景,美国领导层对克林顿政府的中东政策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和反思。在反恐压倒一切之机,作为恐怖主义的主要策源地,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同时,美国将打击恐怖主义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两大威胁提升到了其中东战略的首位。2002年1月29日,布什在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声称,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是新的“邪恶轴心”,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支持恐怖主义”和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外,布什家族代表的是石油利益集团,而石油和地缘经济利益在美国中东政策中的分量有增无减。从民众方面而言,“9·11”发生后,美国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民众对于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的认知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布什政府一系列后续中东政策的出台创造了条件。简言之,“9·11”事件加速了布什政府重新塑造其中东政策和改造中东地区的步伐,美国解决中东问题的紧迫感在上升,使用的手段也更趋激烈。

其次,推行民主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关键。长期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往往是以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为驱动,美国政府历来认定,中东稳定是美国的首要利益。只要阿拉伯国家能够和以色列媾和,能够提供稳定的石油供应,能够帮助美国遏制极端

<sup>①</sup>See James P. Piscatori, ed., *Islam in a World of Nation-states*,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6.

<sup>②</sup>Jörg Friedrichs, “The Meaning of New Mediev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and ECPR, Vol.7, No. 4, 2001, pp. 475~501.

<sup>③</sup>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 21.

<sup>④</sup>同上。

势力，这些国家是否已推行民主无关大局。但“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切，布什政府对此事件反思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专制主义统治创造了有利于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主义势力获取支持的环境，政治自由的缺乏破坏了和平繁荣，民主的缺失是造成中东恐怖主义盛行和政治治理失败的根本原因，因而对美国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推行民主便成为布什政府为恐怖主义、地区冲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中东痼疾所开出的药方，民主上升为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

布什政府先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来试验先发制人战略，试图以伊拉克为样板，在中东形成民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随后又竭力向西方盟友推销，另在八国首脑会议上正式推出了“大中东和北非伙伴关系计划”，在中东地区推行美式民主改革计划，对沙特和埃及等盟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既有利用武力进行政权更迭的一面，又有利用民主来造势以压促变的一面。新保守主义将民主视为解除国家安全隐患的关键，是解决美国在中东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只要实现了民主改革，不管是反恐还是阿以和平都将迎刃而解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推断不仅在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而且在现实中也碰到许多困难。随着美国中东战略的不断推进，其民主战略自身的许多悖论和困境也逐渐暴露出来。

第一，新保守主义分子低估了中东复杂的政治局势，美国官僚机构和学术界的传统中东问题专家的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造成美国的民主设想和中东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布什政府的美国中东政策打破了过去在许多传统禁忌，如忽略巴以问题在中东问题的核心地位，支持库尔德人自治等。但其后续战略又无力解决被其引发的内部矛盾，反使中东各种难点问题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二，美国的激进政策极大地削弱了世俗主义政权的力量，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叙利亚也遭到极大削弱。伊斯兰主义得以借势崛起，或是利用中东地区普遍的反美情绪通过暴力斗争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或是利用美国的民主化改革改变策略，争取通过议会选举夺取国家政权。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培育阿拉伯市民社会来自下而上地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这在客观上进

一步削弱了世俗主义国家机器的力量，帮助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向后者倾斜。由于伊斯兰教在民间具有的深厚民众基础，美国的民主化计划可能最终陷入悖论：民主化导致美竭力避免的伊斯兰化；第三，美国的政策打破了中东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原有的力量对比。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势力急剧扩张，内贾德总统上台后，伊朗更是将伊斯兰的意识形态作为扩大其在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影响的关键载体。伊朗核问题升级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实力消长的现实。

随着美国中东战略的展开，其战线过长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伊拉克非但没有成为美国解决中东问题的民主样板和钥匙，反而牵制了美国在中东最大的精力。伊拉克的联邦制只是使伊保持了名义上的统一，而事实上形成了三派自治的局面，埋下了中东族群冲突的种子。伊安全局势迟迟得不到控制，反而与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甚至以黎冲突等其他中东问题相互呼应，使局势更加错综复杂。这为其他大国参与中东事务提供了机遇，欧盟和俄罗斯以及其他新兴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也在不断上升，影响力日益扩大。在外部因素的触发下，中东地区原有的宗教和种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加速了地区力量分化的进程，为宗教和文化因素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可能。

## 二、宗教认同的兴起及其局限

当前中东地区正在经历深刻和剧烈的变革，在民族主义遭到极大削弱的同时，伊斯兰教的号召力不断上升。这是对目前世界上宗教复兴大潮以及理性/科学与宗教大辩论的一种呼应。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社会的一些负面因素的不断暴露，作为启蒙主义时代最根本前提的理性主义原则受到质疑，宗教正努力从启蒙时代被放逐的状态回归。现代国际关系起源于欧洲宗教战争的结束，因此对宗教的排斥是其与生俱来的特点。后果是，宗教被排除出公共领域，“涉及宗教的政治成为对秩序、安全和文明的最终威胁，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没有立足之地，同样在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也没有立足之地”<sup>①</sup>。但随着现代理性危机的日益凸现，宗教似乎在返回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国际关

<sup>①</sup>Fabio Petito and Pavlos Hatzopoulos,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2.

系的理论家们开始关注起宗教在全球一体化中的作用。一些学者意识到,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打开了一种重大的思想变革道路。宗教带来的不仅是宗教战争或是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更可能倡导一种全球和平价值观。<sup>①</sup>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非西方文明在奋起直追的同时,也兴起了一股重新发现和挖掘自身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潮流,并以此对抗西方过度的物质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斯兰教的作用特别引人注目。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是对理性主义所倡导的政教分离原则的质疑,是对日益陷入危机的世俗意识形态的挑战。在看到其传统一面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推动变革的方面。

同时,随着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被日益蚕食,宗教认同在和民族国家认同的争夺中开始占据上风。在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过程中,世俗的民族主义曾经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构建民族神话和凝聚人心的任务,从非物质的层面上来说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也是一个建构“想象的共同体”过程。“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很少有东西会比民族这个概念更适于完成这个使命。假设如果民族国家确如公众所公认的,是‘新’而且‘历史的’,则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民族’的身影,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未来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正是民族主义的魔法,将偶然化成命运。”<sup>②</sup>然而,民族主义在与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争夺中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虽曾占尽优势,但由于宗教在中东社会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广泛影响以及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先天不足,民族国家认同始终无法彻底取代其他的宗教和文化认同。冷战后,在全球化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民族主义更无法继续垄断这种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在与宗教势力争夺的过程中不断丧失阵地。更重要的是,当前的中东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危机和痛苦的转型之中,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中东地区严重滞后:政治上,各种机构建设不完备,市民社会发展不协调,受到西

方越来越大的民主改革压力;经济上,地区一体化进展缓慢;文化上,在西方强势文明影响下,面临着保卫自身文明的严峻任务。在这社会转型时期,对当地民众最大的挑战是对社会前途和自身命运的不确定性。“现代性作为完全可被理解的原因,破坏了所有古代确定的事;不确定是多数人发现非常难以忍受的条件;因此,任何运动(不单只是宗教的)承诺提供或更新确定,都会有一个预备好了的市场。”<sup>③</sup>世俗政权的应对失误增加了穆斯林群众对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在他们心中,伊斯兰教能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作为一种终极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力量为自己提供一种认同的确定性。“每一个人类社会最终都是被捆在一起面对死亡的人群。宗教的力量所依靠的,说到底,是它交给站在死亡面前,更准确些说,是它交给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人们手中的旗帜的可靠性。”<sup>④</sup>

看到宗教和文化认同因素在中东国家关系的影响不断上升的同时,也不能过分夸大宗教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中东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异常复杂,按民族来分,既有阿拉伯民族、土耳其民族、波斯民族和库尔德民族等主体民族,又有犹太族、希腊族、科普特族等少数民族。在这些民族中,有的已成功地建立起民族国家,有的还在为建国的梦想奋斗;按宗教来分,除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外,还有犹太教、基督教和原始宗教等。各个宗教内部同样派别林立,伊斯兰教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这两大教派又分为若干支派。基督教也分成东正教和天主教两大支,而且两派教会又衍生出许多教义歧异的教派和各自为主的教会。犹太教内部也有着正统派和改革派之分。这些民族和教派相互间的关系复杂多变,往往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它们间的矛盾和冲突呈多种形态,有的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有关,有的却不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与文化的符号和话语经常被用作不同民族、教派乃至国家和国际组织伸张自身利益的工具。因此,“评估宗教在国际政治的角色,将有助于区别各个政治运动之间,哪些是真正由宗教

① Fabio Petito and Pavlos Hatzopoulos,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p. 2.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③ 【美】彼得·伯格:《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李骏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④ 【美】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所唤起的，以及哪些是基于略为非宗教的利益至上的政治议程，利用宗教作为一个方便的合法性。”<sup>①</sup>

虽然冷战的结束促进了中东地区多重认同的发展，但很多情况下，同一宗教目标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小集体的认同经常以大的宗教认同形式表现出来。正如亨廷顿所说，“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sup>②</sup>因此，许多以宗教为名义进行的活动，背后实际涉及的可能是现实利益的纠葛。“一般来说，很多这些宗教运动是与一些非宗教动力连结在一起，并且前者在未来的方向至少将会被后者的方向所决定。”<sup>③</sup>以伊朗核问题为例，自去年夏天内贾德当选总统以来，伊朗外交政策的伊斯兰倾向日趋明显，内贾德为代表的伊朗领导人经常发表一些具有强烈伊斯兰色彩的言论，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并对伊朗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表面上，伊朗对自身伊斯兰认同的强调损害了它的国家利益，但如果仔细研究伊朗政策的这种变化，其背后自有其特殊的原因和逻辑。伊朗核问题的升级、哈马斯和真主党与以色列冲突的加剧，背后都有一个关键的连接点，那就是海湾地区原有均势的失衡和伊朗作为具有核潜力的地区大国的重新崛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伊朗的战略地位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其影响力迅速向中亚和海湾扩张，并影响到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力量平衡，伊朗表现出一种以地区和伊斯兰世界代表自居的势头。内贾德通过伊斯兰话语发表反以言论，其矛头隐指各阿拉伯国家，一方面是为了将危机泛化到整个中东地区，分担其在核问题上所受到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巴以问题和黎以问题借势削弱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扩大什叶派的影响力，实现伊朗的地区大国雄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因素在伊朗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上升，既是伊朗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更反映出它将短期和长期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战略思考。

尽管宗教的力量在不断增长、民族国家的地位

受到冲击，民族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呈现出你进我退的态势，但中东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并没有完全停止，而是出现了一种建构和解构同时并进的双重过程。对那些试图夺取国家政权的伊斯兰组织而言，在参与现实政治角逐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当前民族国家体系的现实。以哈马斯为例，人们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宗教激进组织，但从哈马斯过去的发展历史来看，它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伊斯兰的意识形态与灵活的政治策略结合在一起。哈马斯生存在一个十分复杂和多变的环境中，面临着具有不同需要和渴望的巴勒斯坦民众，必须适应其所处的政治世界而不为其教条所束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哈马斯如何严守其纲领和教条，而在于如何为其追求现实利益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变化。哈马斯上台后，它不仅面临着从军事组织向政治组织转变的挑战，更受到现实政治规则的束缚，而且内部的分化趋势也在日益加剧。耐人寻味的是，2006年6月底，几乎在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士兵的同时，哈马斯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签订协议，试图组建民族和解政府，这两件似乎相互矛盾的事件突出了哈马斯内部可能出现的分裂：对现实有更清醒认识的本土派和远在大马士革的强硬派之间的分歧。<sup>④</sup>在黎巴嫩，随着真主党越来越融入到国内政治进程，它的现实路线和意识形态路线之间的斗争可能同样会出现。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种多元认同的结构正在中东地区出现，虽然宗教和文化认同对原来主导的民族国家认同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但基本的力量均衡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相互竞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重的一面，它们之间的互动对这种认同结构的塑造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东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格局的走势。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校对：孙德刚）

①【美】彼得·伯格：《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第19页。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③同 ，第16页。

④Christopher Hamilton, "Tracking Hamas's Leadership: Insights into the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June 30, 2006,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2482>.